

我国西南地区乡村旅游振兴： 发展、问题与对策

杨璐 滕任飞 黄韫慧¹

【摘要】乡村旅游作为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近年来发展蓬勃，逐渐从单一的参观模式向与生态农业、田园综合体等多元业态的方向发展。然而，不同区域之间的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凸显，本文着眼于旅游资源丰富但发展尚不充分的西南地区，借助不同发展阶段的政策信息和统计年鉴数据予以探索分析，回溯其乡村旅游发展历程。结合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深刻内涵，联动生态、经济和文化视域，指出当前我国西南地区乡村旅游发展存在着三大问题：生态文明改善不足、经济带动作用不充分以及缺乏文化影响力与吸引力。因此，要重点依托供给侧视角阐释相应对策，探寻我国西南地区乡村旅游振兴的未来发展方向，实现生态、经济、文化效益“三位一体”的系统性合力循环，以期最终达成乡村振兴的总体要求。

【关键词】乡村振兴 乡村旅游 西南地区

【中图分类号】F590.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470(2022)-06-0135(10)

一、引言

2021年，在我国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三农”问题的工作重心转移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构建高质量发展新格局兼具重要意义。其中，发展乡村旅游作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由此，乡村旅游对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及实现路径得到了各界研究的重点关注。例如，乡村旅游的发展会通过经济、文化和治理层面推动乡村振兴，即经济上有利于促进生产要素在城乡间的双向流动；文化上有利于精神文化的传承；治理上有助于优化治理网络结构，缓解乡村危机。^[1]旅游产业发展还具备“乘数效应”，可以充分带动新农村建设。^[2]此外，从农民增收致富的角度切入，乡村旅游创造大量就业岗位，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实现农民致富，进一步推进乡村振兴。^[3]与这些研究相呼应，2022年1月，国务院发布《“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更加明确指出“旅游是助力乡村振兴的主力军，依托红色文化资源和绿色生态资源大力发展乡村旅游，进一步夯实了乡村振兴的基础”。

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发展乡村旅游势在必行。然而，在我国乡村旅游不断发展的同时，各个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也逐渐显露。此外，不少地区的乡村旅游发展还面临产品同质化严重，基础设施建设不足等问题，并使其市场竞争力下降，发展频频受限。^[4]本文重点关注我国西南地区乡村旅游的发展问题，一是因为发展乡村旅游的必要性，西南地区乡村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乡村振兴的可供选择的通道有限，旅游是促进其发展的重要助推器。二是因为旅游资源的充分性，西南地区乡村旅游资源丰富，自然风光和民族文化多样，旅游空间集聚，呈现良好发展态势。本研究也指出，相较于东、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乡村旅游

¹**作者简介：**杨璐 副教授 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江苏南京 210095

滕任飞 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江苏南京 210095

黄韫慧 教授 南京大学商学院 江苏南京 210008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省文化和旅游科研课题重点项目“扬子江世界级城市休闲旅游带竞争力提升研究”（编号：21ZD04）、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外部环境线索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研究”（编号：KYQN202200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见微知著’视觉信息对消费者绿色产品评价的影响及心理机制研究”（编号：7210210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黄根慧为本文通讯作者。

的公共服务水平发展活跃度最高，并已进入上升周期。^[6]

现有关于西南地区乡村旅游的研究多集中于宏观角度对乡村旅游带动乡村振兴的论证和机理探讨，比如提出西南地区生态旅游与乡村振兴存在耦合发展关系，^[6]再比如西南地区特色旅游通过旅游带来的正向效应，推动了乡村振兴的实现。^[7]此外，也有部分研究从微观视角着手，关注于一个具体地点并提出针对性建议，比如以云南省为例，指出其发展需凸显个体优势，^[8]以及以贵州省为例，强调石漠化治理在乡村旅游发展中的重要性。^[9]但鲜有研究从系统性视角剖析，以乡村振兴的新价值导向为指引，提炼西南地区乡村旅游发展的关键问题，并提出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基于此，本文首先通过回溯西南地区乡村旅游发展历程，以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中心，从经济、生态、文化三元视角对现有西南地区乡村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和障碍进行了总结，并以此提出对应建议，以期实现三者互促发展的新局面，并最终达成乡村治理有效、村民生活富足的目标。此外，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以经济学、旅游管理学与市场营销学的相关理论为基础，辅之以西南地区乡村旅游的统计年鉴数据以及具体案例，共同构建西南地区乡村旅游“三位一体”的发展新模式。

二、西南地区乡村旅游的发展历程

1. 起步萌芽阶段（1949 年到 1977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经济发展重点为农业的种植业、重工业和国防产业。当时西南地区乡村旅游发展的基本条件如交通和经济尚未成熟。

就交通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云南省只拥有窄铁路 66. 多公里和只能起落小型飞机的昆明巫家坝机场；贵州省基本没有铁路，省际交流主要依靠低标准公路以及从贵阳延伸到昆明和重庆的民航线；四川省也仅有简陋公路与某些内河航道和民用航交线；而西藏自治区直到 1951 年才开始缓慢出现现代交通设施。因重庆市于 1997 年 6 月才正式成为直辖市，所以暂不予以讨论。经济上，当时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探索阶段，整体波动较大，增速缓慢。根据 CEER 中国分地区宏观数据，此时西南地区各省的生产总值以及年增长率都相对较低。比如 1960 年后，贵州省年增长率仍仅有 2%~3%，云南、四川两省也仅为 5%~10%。Skerritt 和 Huybers 的研究指出，总体经济情况可在一定程度上正向反映旅游业的发展。^[9]因此，此时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指标也从侧面折射出旅游业的发展困难重重。

总体来说，这一阶段我国旅游业发展的大环境不完善且波动较大，乡村旅游作为旅游业的一个分支，虽然与农业这个第一产业有关联，但尚未形成紧密联系。因此，乡村旅游整体处于起步萌芽阶段。

2. 筑基发展阶段（1978 年到 2000 年）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推进，我国经济发展迅速，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与此同时，乡村旅游也逐渐形成以城市郊区采摘和农家乐为代表的初级形态。^[10]

改革开放在空间上由东向西推进。^[11]由于地理位置原因，虽然西南地区改革开放红利出现的时间相比东部沿海等地区较晚，但该阶段西南地区各省生产总值仍整体呈现指数型增长的趋势。同时西南地区的交通运输配套业已开始有所提升。在基础设施双重改善的背景下，这一阶段西南地区乡村旅游发展取得了多个“从无到有”的成就。比如 1986 年成都“徐家大院”首次推出了“农家乐”的旅游模式，以及 1989 年“中国农民旅游协会”正式更名为“中国乡村旅游协会”等，我国乡村旅游发

²①李文路，覃建雄，张江峰：乡村旅游发展与石漠化治理、乡村振兴成效耦合协调研究——基于黔南州喀斯特地区的实证。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中国知网独家网络首发，2021 年 8 月 3 日。

展开始走向正式化、规范化。

此外，在乡村旅游的供给侧方面，制度保障和推广宣传也提供了新的助力。西南地区乡村旅游逐渐向法制化、规范化的方向前进，这不仅为其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还使其通过招商引资等形式促进资金流动，催生了经营模式的创新；推广宣传上，西南地区也正式开始了旅游产业与民俗文化、乡村地区的结合。比如 1995 年就曾出现了“中国民俗风情旅游”的旅游主题与“中国：56 个民族的家”等宣传口号，带动游客深入少数民族风情区；1998 年“中华城乡游”主题以及“现代生活，多彩生活”的倡导也吸引了大量游客涌入乡村。

除了供给侧，需求侧消费者的收入水平提高和假期时间增多也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了机遇。西南地区各省居民消费指数呈现上升趋势（见表 1），标志着居民生活水平与福利水平得到提升，这为旅游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与此同时，我国休假制度也推行了改革，双休制度得以完善，2000 年“五一”“十一”黄金周概念提出，给予了居民更多可自由支配的时间。

表 1 西南地区各省居民消费指数（1978 年～2000 年，上一年=100）

年份 省份	1978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贵州省	101.4	108.2	107.7	101.8	121.4	99.5
四川省			107.6	103.8	118.5	100.1
西藏自治区				105	119.4	99.9
云南省	100.2	104.7	108.2	102.8	121.3	97.9
重庆市						96.7

注：表中数据来源为 CEER 中国分地区宏观数据（1978 年～2000 年）。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阶段，交通仍然是限制西南地区旅游发展的主要因素。根据 2014 年《中国交通运输统计年鉴》与 2018 年《中国交通年鉴》的数据，虽然我国铁路里程由 1979 年的 5.3 万公里增加到 1997 年的 6.67 万公里，公路由 87.75 万公里增加到 122.64 万公里，但仍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增速比较缓慢，比如铁路里程，年增长仅约为 0.09 万公里；二是增长不平衡，交通增长主要集中于东部和东南沿海，西南地区的建设仍然较少。

3. 多元稳步发展阶段（2001 年到 2013 年）

这一阶段，交通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政策支持和法律建设同步加强，整体呈现多元稳步发展的态势。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2 年至 2012 年的数据，铁路方面，贵州省由 0.19 万公里增至 0.21 万公里，提升了 10.53%；四川省增加了 20.69%；西藏自治区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云南省实现了 7.69% 的增长；重庆市的增长更是高达 114.29%。同时间段中，西南地区各省的公路长度也均有显著增长，其中云南省、西藏自治区、四川省、贵州省和重庆市的增幅分别高达 32.87%、63.82%、162.29%、272.17%和 288.1%。上一阶段之中，西南地区旅游发展的重要限制因素——交通基础设施，在这一阶段得到了彻底解决。以铁路与公路为代表的交通设施建设的迅速推进，极大方便了西南地区的内部联系与外部交流，为乡村旅游提供了交通基础的保证。

在这一多元稳定发展阶段中，西南地区乡村旅游的发展目标主要集中于完善政策支持、加强法律制度建设等方面。更重要的

是，发展乡村旅游还被赋予了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使命。为了进一步改善西南地区的“三农”问题，鉴于乡村旅游的综合性及其对经济的带动作用，发展乡村旅游被正式提上日程。^[12]为实现上述发展目标，国家层面也在土地流转和乡村旅游制度规范建设等方面提供了相应的政策支持。

在土地流转方面，2005 年~2006 年，我国实行并健全了土地承包经营流转机制，鼓励发展适度规模经营；2007 年规范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2008 年健全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一系列举措的提出克服了乡村旅游发展所受到的土地制度制约，为旅游中的土地资源供给提供了良好的政策基础。在制度规范建设方面，国家旅游局颁布了一揽子计划，促使乡村旅游的经营模式更加科学化、合理化和多样化。如 2002 年，我国颁布了《全国工农业旅游试点检查标准（试行）》，其标志着我国乡村旅游开始走向规范化、高质量化。2006 年 8 月，国家旅游局发布《关于促进农村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重要发展途径。2007 年，国家旅游局和农业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大力推进全国乡村旅游发展的通知》；2008 年出台《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一系列举措共同为乡村旅游在下一阶段的深入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4. 新时代发展阶段（2014 年至今）

2014 年开启新时代发展阶段，经济发展和交通设施建设日新月异，乡村旅游发展的基础条件已全面具备，进入腾飞时期。

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年度报告（2017 年）》显示，2014 年~2017 年我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行业市场规模快速增长，经营收入由 3000 亿元增至 6200 亿元。2017 年农业部更是通过一系列行动促进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如召开首届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大会，推介了 150 个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认定第四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29 项，同时发布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景点 2160 个、精品线路 670 条。在这一乡村旅游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西南地区乡村旅游在旅游建设和经济发展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旅游建设方面，根据艾媒咨询发布的《2020 年中国乡村旅游发展现状及旅游用户分析报告》，2020 年西南地区入选第二批乡村旅游重点村数量总计达到 113 个，约占全国的 16.6%。此外，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中重点建设的国家旅游风景道和跨区域特色旅游功能区中，西南地区多地入围（详见表 2）。这为未来西南地区乡村旅游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

表 2 “十四五”旅游发展规划中西南地区国家旅游风景道和特色旅游功能区布局

规划项目	四川	云南	西藏	贵州	重庆
------	----	----	----	----	----

国家旅游风景道	①川藏公路风景道（四川成都、雅安、康定、巴塘-西藏林芝、拉萨）②大巴山风景道（陕西西安、安康-四川达州、广安-重庆）③滇川风景道（云南楚雄-四川攀枝花、凉山、雅安、乐山）④香格里拉风景道（云南丽江、迪庆-四川稻城-西藏昌都）	①滇川风景道（云南楚雄-四川攀枝花、凉山、雅安、乐山）②滇桂粤边海风景道（云南富宁-广西靖西、崇左、钦州、北海-广东湛江）③香格里拉风景道（云南丽江、迪庆-四川稻城-西藏昌都）	①川藏公路风景道（四川成都、雅安、康定、巴塘-西藏林芝、拉萨）②香格里拉风景道（云南丽江、迪庆-四川稻城-西藏昌都）	①乌江风景道（重庆武隆、彭水、酉阳-贵州遵义、贵阳、铜仁）②西江风景道（贵州兴义-广西百色、柳州、荔浦、梧州-广东封开、德庆、肇庆）③武陵山风景道（湖北神农架、恩施-湖南湘西-贵州铜仁、遵义、黔东南）	①乌江风景道（重庆武隆、彭水、酉阳-贵州遵义、贵阳、铜仁）②长江三峡风景道（重庆长寿-湖北神农架、宜昌）③大巴山风景道（陕西西安、安康-四川达州、广安-重庆）
跨区域特色旅游功能区	秦巴山区生态文化旅游区（跨省）、香格里拉民族文化旅游区（跨省）	香格里拉民族文化旅游区、滇黔桂生态文化旅游区（跨省）	香格里拉民族文化旅游区（跨省）	乌蒙山民族文化旅游区、滇黔桂生态文化旅游区（跨省）	长江三峡山水人文旅游区

注：表中信息系作者根据《“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内容整理所得。

经济发展方面，这一阶段西南地区的旅游收入增长明显。根据西南地区各省的统计年鉴数据（见表3），贵州省的旅游收入在2015年存在分水岭。前期增长较缓慢，平均每年增长16.14%，后期平均每年增长高达36.34%。四川省和云南省作为旅游大省，因其丰富的自然、人文景观，增速一直较快。同样地，2015年前也相对较缓，四川省平均每年增长30.12%，云南省则为28.30%。2015年后，经济增长加快，但由于其本身旅游产业基数大，同比增长减缓，但名义经济增长量仍然庞大，四川省平均每年增长1284亿元，云南省则是1981亿元。西藏虽然存在海拔较高、交通不便等问题，但随着近年来政府对于西藏地区的铁路建设加快，其旅游业发展也稳步提速。

表3 西南各地区国内旅游收入 单位：亿元

年份 省份	2013	2014	2015	2018	2019
贵州省	2358.18	2882.66	3500.46	9449.58	12296.03
四川省	3830.04	4838.34	6137.6	10012.72	11454.48
西藏自治区	157.73	194.99	271.06	473.74	540.44
云南省	1961.55	2516.87		8698.97	10679.51

注：表中数据来源为《西藏统计年鉴》（2020）、《云南统计年鉴》（2015、2019）、2019年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贵州统计年鉴》（2020）、《四川统计年鉴》（2017、2019、2020）。由于数据收集限制，重庆市的部分数据暂缺。仅根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8），得知重庆2017年国内旅游收入为3176.5459亿元。

值得关注的是，这一阶段，乡村旅游的发展目标也不断升级，逐步纳入可持续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乡村振兴等重要理念。一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理论，凸显了乡村旅游发展中生态建设的重要性。二是随着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蓝图也徐徐展开。“一带一路”包含了我国中西部省份以及沿海的发达地区，旨在向西加强与欧亚大陆的内陆国家联系，向东发展海外贸易，实现由东向中再到西的阶梯式发展。这对我国旅游业，尤其是对西南地区旅游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三是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正式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新路径，乡村旅游通过优化农村产业结构，提高农民收入等方式盘活乡村资源，促进要素流动，实现乡村振兴。

综上所述，我国西南地区乡村旅游历经了从萌芽阶段到鼎盛时期的四个阶段的发展过程。

三、西南地区乡村旅游发展问题剖析

西南地区在其乡村旅游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许多问题也陆续凸现出来。比如生态文明改善不足、经济带动作用不充分、缺乏文化影响力与吸引力。此外，生态、经济、文化这三个维度的问题，两两之间还会互相交叉融合。鉴于此，下文将首先对存在这三个维度问题的原因分别进行阐述，接着在交互的视阈下进一步论述解决这三个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1. 生态文明改善不足

西南地区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生态问题突出的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西南地区自身的生态环境敏感而复杂，存在植物资源破坏，野生动物资源侵害，地下水源污染，生态景观破坏等诸多重大生态风险。^[13]例如贵州省的喀斯特地貌，常伴有水土流失、坍塌等隐患。二是在西南地区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引发了部分空气污染、噪音污染、水污染等。”^[14]传统旅游产品的六要素“吃住行游购娱”，都离不开存在高污染可能性的基础设施建设如交通、民宿、工厂等。三是部分乡村旅游开发粗放，看重短期利益。优先考虑高经济效益而非可持续的生态效益，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不够科学合理，环境保护工作不力。^[15]

2. 经济带动作用不充分

西南地区乡村旅游发展对经济的带动作用尚不充分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产业链、价值链亟待拓展。目前西南地区乡村旅游产业链较短，深加工不足。旅游产品往往止步于农产品采摘观光，附加值较低，缺乏产业融合和结构升级。例如，2021年“智博会”上重庆市文旅信息中心和重庆理工大学联合发布的《西南地区乡村旅游大数据报告》显示，西南地区乡村旅游中仅自然风光、历史古迹、村寨游览、农业景观与体验这五种类型就累计占比高达86.8%，旅游产业链的长度和深度都有待提升。二是不同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协作不够。不同地区之间独立发展，尚未形成较好联动机制，导致未能形成合力，没有发挥规模效应。体现在旅游产品上，出现旅游路线规划不够连贯、各景点分隔等现象，致使游客停留时间短，单位游客价值相对较低。上述报告也指出，西南乡村旅游发展整体呈现“东强西弱”的布局。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发展较好，云南省则相对较为薄弱。此外，即使是同个省份的不同地区也存在较大差距，根据区位理论，在乡村旅游发展中，部分地区会率先出现“增长极”，（成吸引更多优质要素流动至此，产生“回波效应”，造成了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增长极”的过强优势，又进一步导致短期内无法出现足够的扩散效应来代替回波效应的主导位置。三是对新技术的敏感度不足。智慧农业，互联网+旅游等新兴商业模式的出现，为乡村旅游的开发提供了新可能，如参观体验人工智能养殖业等。以往的生产技术等要素向乡村流动时间长，成本高，存在衰减效应；而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却可以消弭这一差距，促进要素流动。因此，迎头抓住新兴技术，创新西南地区乡村旅游模式显得尤为重要。但目前根据上述报告，西南地区乡村旅游发展模式不够多元，技术牵引不足。

3. 缺乏文化影响力与吸引力

西南地区乡村旅游缺乏文化影响力与吸引力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文化定位缺乏独特性，在乡村性（Rurality）、民族文化特色、有形化展示方面尚有欠缺。首先，乡村旅游的主要目标客户为城市人群，乡村性、田园风味是乡村旅游项目区别于城市钢筋水泥的亮点。目前部分西南地区乡村旅游项目在设计中为了更好提高游客体验，盲目追求基础设施优化与现代化，不自觉地损失了部分乡村性。其次，西南地区是我国主要的少数民族聚居区，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全国 55 个少数民族，均在西南地区有常住统计，如布依族、傣族、保保族、苗族等，民族多样化显著。但目前很多项目趋于雷同，差异化定位与宣传缺失，未能充分发挥民族资源的禀赋优势。最后，部分旅游服务人员缺乏专业化培训，在民族特色文化、乡村文化传递的过程中缺少有形展示，这也使得游客未能真正沉浸其中，难以充分理解、认同并传承文化精神，降低了文化的影响力。第二个主要原因在于文化遗产开发不充分。西南地区独特的地理、气候与民族特征孕育了大量的农业文化遗产、民俗文化、红色文化等，开发潜力巨大。’低但目前西南地区上百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项目，许多只是简单的产品堆砌，对文化遗产精准挖掘不足，未能借助自身的文化优势形成独特定位与氛围，缺乏核心竞争力和可识别性，进而也降低了文化的吸引力。

4. 生态、经济与文化的交互视阈

在当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实现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优选之路，需要紧密贴合乡村振兴的总体要求，发挥生态、经济与文化效益的交互统一效用，最终实现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带动整体的乡村振兴。因此，本文创新提出“三位一体”的乡村旅游发展新模式框架（详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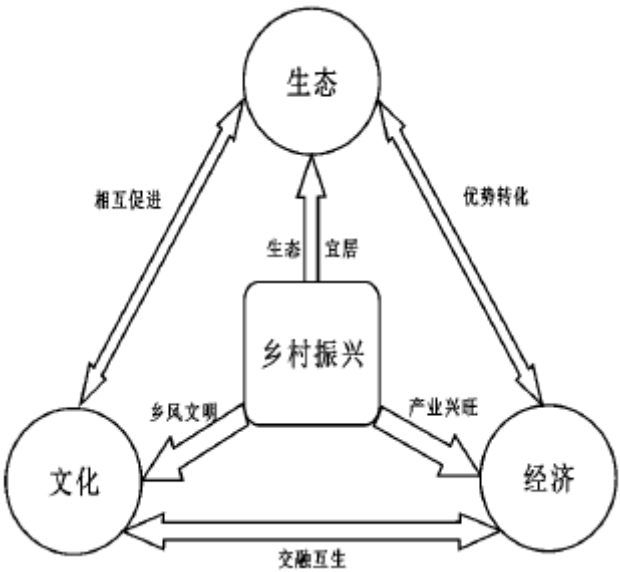


图 1 “三位一体”发展新模式框架图

（1）生态优势与经济优势之间互相转化。一方面，西南地区乡村具备的独特生态资源优势，如四川省南充的亚洲候鸟迁徙栖息地农业公园，云南省的普洱茶园、贵州省的荔波喀斯特世界遗产地、重庆市的川河盖旅游景区、西藏的布达拉宫等。依托生态资源优势开发乡村旅游业，有利于实现劳动力、资源等生产要素的加速流动，带动经济发展，实现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为生态文明改善、乡村环境治理等优化生态资源的措施提供了强大的资金支撑。乡村旅游带动经济发展越来越好，生态文明，环境也随之日趋改善，形成了正向循环。

（2）生态与文化发展相互促进。特色生态资源往往和特色文化紧密结合，相互辉映。例如，云南省腾冲市银杏村，不仅拥有

连片的银杏林生态景观，还以银杏为文创 IP，孕育了独特的“银杏文化”，蕴含着长寿、幸福等美好寓意。一方面，生态资源成为了文化活化的重要有形展示和依据；另一方面，文化的不断衍生发展，也为生态资源赋予更多精神价值，极大提升了村民的民族文化认同和生态保护及改善的决心与动力。

（3）经济与文化之间交融共生。文化伴随着经济发展凝聚力不断增强，同时提升文化自信，拉动经济增长。经济的发展繁荣，也为文化复兴与充实提供了条件支持。两者相辅相成，携手共进。举例来说，贵州省黔东南州的西江千户苗寨，从2008年正式开发到2018年，短短10年之间，就从原先的“经济落后，文化保护乏力”的村落转变成“经济繁荣，民族文化遗产创新动力强劲”的乡村旅游目的地，^[19]实现了经济文化的双繁荣。这一成就背后的重要原因来自于在乡村旅游的开发中对苗族文化的挖掘、活化与传承，打造文化品牌，发展文化遗产，实现了文化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又反作用于文化创新，最终实现交融共生。

四、对策与建议

针对上文中提出的生态、经济和文化视角的三大问题，本文试图分别结合旅游管理、经济学与市场营销等理论内容，以系统性建设西南地区乡村旅游的视角，提出以生态环境、产业布局和特色文化为重点抓手，均衡协调发展，以最终实现乡村振兴的总体要求，达成“软（文化）硬（经济）兼施（生态）、动（民俗活动）静（自然风光）结合”的目标。

1. 科学开发利用乡村旅游自然资源，构建良好生态发展体系

依照可持续发展理论，发展乡村旅游需要考量长期利益，不能损害后代利益来满足当代人的需求。^[20]这不仅要求西南地区在开发设计乡村旅游产品时，要注重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更要求创新乡村旅游发展形式，依托生态资源打造如康养旅游等环境承载压力小的新兴旅游范式，打造从供给侧开发源头到消费侧游客影响的全体生态友好的乡村旅游模式。例如，李莺莉和王灿的研究^[21]就以成都“五朵金花”（即成都市锦江区三圣乡的花香农居、幸福梅林、江家菜地、东篱菊园、荷塘月色）乡村旅游为例，探究了其生态转型的成功经验，并验证了对自然资源合理利用，污染防治，创新田园风光与艺术创作结合等方式的有效性。因此，本文认为构建乡村旅游良好的生态发展体系可以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入手。

供给侧角度，西南地区在开发乡村旅游的过程中，一是需要因地制宜建景观，做好对生物资源，如野生动物、植物、群落完整性，土地资源、水资源等的保护。二是实施合理规划，注意后期的乡村公共环境卫生治理。例如对于西藏牧业地区，实施生活垃圾定期清理、生活污水排放管控等规定，实现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更为重要的是，结合各地区资源禀赋，集约开发创新生态旅游产品。比如，发挥贵州省“天然氧吧”优势，发展乡村与康养、养老、田园养生结合的新型旅游模式，让游客沉浸体验“洗肺吸氧游”。再比如贵州江侗乡稻鱼鸭复合系统，通过开展展馆等方式，实现了保护农田的生态和农民增收的价值共创。

需求侧视角，旅游作为服务业，考虑到服务的易逝性，服务资源难以储存、转售。因此，面对旅游淡旺季，考虑通过创新业务形式实现人口分流，比如春天发展鲜花游，夏天发展避暑游，秋天发展温泉游，冬天发展冰雪游等。这样不仅将有利于缓解短期旺季游客暴增的生态压力，还会提高淡季的村民收入。

2. 形成全产业链融合、跨区域协作、科技赋能的经济助力新模式

针对目前西南地区乡村旅游经济发展的三个问题：产业链亟待拓展、各地区发展不平衡以及新技术敏感度不足。本文分别提出以下全产业链融合、跨区域协作与科技赋能的三项针对性建议。

（1）全产业链融合。通俗来讲，全产业链融合也即将乡村旅游业与第一、二、三产业进行有机融合，形成“1+2>3”的合力。乡村旅游是涉及了一、二、三产的复合产业，利用其复合性，可以有力推动全域乡村旅游发展。首先，对第一产业而言，通过打造示范农庄、田园综合体等农旅一体化的产业升级方式，提升价值链，实现乡村旅游与“休闲农业”的深度结合，给予游客们沉

浸式体验。此外,创新营销方式为农业赋能,使农作物在生长的过程中农民也拥有资金流动,缓解压力,创造价值,如开展认养一棵猕猴桃树等创意活动,并同时注重品牌的力量,打响特色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如云南普洱市普洱茶等,力争实现“三品一标”“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等认证,实现“绿色、无公害、有机”的品牌联想。其次,与第二产业的结合可以通过延展产业链的方式,进行高附加值产品的深加工,提高投入产出效率。例如,发展衍生产业,农产品加工,旅游观光纪念品加工等。此外,还可借助于对口帮扶的科技力量,例如南京农业大学菊花课题组不仅在贵州省麻江县卡乌村打造菊花基地,赏菊游览,还联合生产菊花沐浴露、洗发水等深加工系列产品,实现村民利益共享。最后,对第三产业而言,可以着重将乡村旅游与酒店行业、医疗养护行业、信息产业、文化产业相融合。如注重乡村住宿条件的优化,建设有民族特色的民宿,培育医养等新经济增长点等,巩固乡村旅游吸引力,促进口碑传播,提高“复游率”,打造忠诚度。再比如借助旅游期间的客流量、网络视频平台等,促进互联网传播,打响知名度。另外,发掘文化特色,如侗族的诗歌艺术、苗族的节日庆典与具有特色的传统服饰,将地方特色通过可视化的文化载体予以展现,打造美誉度,最终实现以旅促融。

(2) 跨区域合作。鉴于西南地区乡村旅游发展存在区域不协调的情况,本文认为提出两点建议可以予以改善。一是发挥城乡之间合作势能,打造“环城游憩带”,加速城乡之间要素流动,发挥城市的“溢出效应”。这也恰与《“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中提出的发展城市居民“微度假”“微旅游”的理念相契合。二是开发联合路线,加强区域合作互补,发挥规模集聚效应。以点连线,以线带面,优化旅游布局,形成有效梯队。借助于部分西南地区的强势乡村旅游景点,实施联合线路开发,并佐以捆绑营销策略,实现互相联动的新格局。例如,《“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提出加强对“三区三州”旅游大环线建设,“优化提升丝路文化经典线、边境极限体验线、滇藏茶马古道寻踪线、大香格里拉人间乐土线”。这一旅游大环线经过四川、云南和西藏自治区,拥有滇池、九寨沟、大熊猫栖息地、羌族刺绣、藏戏等多处知名自然和人文景观。从需求侧看,这无疑实现了游客需求升级,增加了游客在西南地区游玩的时间长度、空间广度和项目深度。此外,不同地区之间形成合理布局的旅游景观梯队,培育和疏导部分“增长极”。基于区位理论,这对于增加“扩散效应”,减缓“回波效应”的负面影响等具有重要价值。

(3) 科技赋能。在全球新冠疫情的背景下,旅游业受到极大冲击。发展在线旅游、智慧旅游是不可逆的大势。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5G、云计算等新技术培育西南地区乡村旅游示范区,对于获客、提升游客体验、延长旅游产品生命周期具有重要意义。获客上,西南地区乡村旅游应该抓住浪潮,借助于短视频、直播等社交媒体的东风,以第一视角叙述乡村故事。类似地,《2021 年旅游助力中国乡村振兴研究报告》也指出短视频平台自带的流量、不设限的内容创作与分享已实现了特有的在线旅游交易闭环“内容+KOL+宣传获客+预订”。提升游客体验上,小到全覆盖的 WIFI 信号,大到 AR 增强现实、VR 虚拟现实等新技术的运用和数字化展示,让游客在互动中沉浸式体验自然风貌和风土人情。这些都将共同塑造游客的旅游体验,形成印象深刻的记忆点。延长旅游产品生命周期上,新技术的更迭不断实现与乡村旅游的结合,并体现在旅游产品内容的更新上,如通过 AR、VR 技术提供文物真实感知,机器人表演等新兴体验,可以极大程度减缓游客面对诸多类似旅游项目而产生的厌足感。近年来,西南地区已有一系列技术融合乡村旅游产品的面世。例如 2020 年“想去乡游”小程序,为游客提供了全国乡村旅游的路线推介,景点介绍,乃至“云观赏”等系列活动,其中涉及西南地区的精品旅游路线共有 121 条,其中四川地区 38 条,西藏 11 条,云南 28 条,贵州有 26 条,重庆有 18 条。小程序精准分类顾客群体,将推荐类别分为自然风光、亲子旅游、健康养生、休闲度假、采摘体验、特色民宿等六种可供选择的层次,给予潜在旅游群体足够的选择权和丰富而有价值的参考信息。再比如,通过 5G 和物联网技术,中国移动在云南省建成了勐巴拉雨林数字小镇,通过“游云南”的手机 APP,提供拍照识花、找厕所、景点直播等多项人性化功能。这些都为未来探索西南地区乡村旅游发展的新模式提供了参考方向。

3. 树立差异化民族文化定位,充分发掘与传承文化遗产

根据营销学定位理论,只有通过差异化定位植入消费者心智,品牌才具备核心竞争力。因此,想要实现西南地区乡村旅游特色发展,避免同质化竞争,重点需要依托于各地区的民族特色文化和历史传统,挖掘文化遗产的新价值与新内涵。

(1) 从文化定位角度,通过保留乡村性、突出民族和民俗文化特色以及提高文化有形感知的组合拳,有利于实现差异化。具体而言,一是要保留乡村性。时刻谨记乡村旅游的基石是乡村,是质朴天然的生活方式和“乡愁”的情感寄托。通过打造慢生

活、田园生活、舒压感受原生态等方式吸引城市目标客群。依照自身的资源禀赋，打造核心竞争优势。例如 2019 年国家发改委会和文旅部共同对乡村旅游典型案例进行了汇编，^[22]并划分为乡村民宿带动、民俗文化依托、景区发展带动、生态资源依托、田园观光休闲和旅游扶贫成长六大类型。其中，四川省绵阳市安州区以“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口号，通过《西游记》拍摄地白水湖、安州山歌会、非遗展示等系列“乡愁”文化活动广受游客青睐，并成功入选田园观光休闲类案例。二是要突出民族和民俗文化特色。将本地特色文化与旅游业以及其他产业相结合，生成特色标签和“拳头”景点，打响“金字招牌”。例如入选民俗文化依托型安利的四川省成都市安仁古镇，因其丰富的博物馆历史资源，专著打造文博文创特色文化，被誉为“中国博物馆小镇”。未来，还可以考虑与企业合作，借助企业成熟的媒介与渠道进入市场，扩大知名度，帮助旅客了解当地的风俗文化，积累潜在新游客。例如，旅游纪念品乃至园区打造等都可以考虑与诸如花西子等拥有中国传统文化打造运营经验的企业进行合作交流。三是要提高文化的有形感知。通过创造文创 IP，生成周边手信产品，艺术作品制作等有形方式传递特色文化内涵，实现精神共振。根据本地特色民俗文化打造文创 IP，比如借助在广西地区流传甚广的《百鸟衣》故事，创造符合故事中“鸟”的文创 IP，制作成相应的挂件饰品、十字绣、服装等，并开发体验性、参与性、互动性高的 DIY 活动。此外，在合理范围内允许文化的二度创作，如民族仿妆等，通过互联网平台进行口碑传播，扩大文化影响力。

(2)从文化遗产挖掘视角，需要强调特色文化遗产的深度挖掘与传承。在特色文化遗产挖掘方面，根据乡村文化遗产旅游的 ASES 模型，好的文化遗产旅游开发需要具备原真性(Authenticity)、舞台化(Stage)、体验性(Experience)和可持续性(Sustainable)。因此，以 ASES 模型为标尺，西南地区乡村旅游项目在进行文化遗产开发时，可以基于其自身特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村落历史、红色文化等联动品牌打造和产业发展，例如云南红河的农耕文化、入选重庆历史文化名村的寨山坪村和四川省泸定桥旅游景区等。根据国务院发布的《“十四五”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对于西南特色文化重点提出了“成渝地区双城文化产业群，建设巴蜀文化走廊，推动川剧、川菜、蜀锦、蜀绣、石刻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培育优势集群”和“西南民族特色文化产业带，突出西南少数民族文化活态化展示、利用和融合发展，打造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民族特色文化产业集群，加强茶马古道文化遗产挖掘”等。这不仅为西南地区乡村旅游的文化挖掘指明了方向，也提示了“民族文化串联”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在发展特色文旅产业的同时考虑各地区之间的联动，形成有机整合。通过整合统筹路线规划，考虑发展类似于欧洲 10 天 10 国游的文化旅游休闲农业；而在挖掘后的文化传承方面，可以通过创新旅游产品形式以及文化遗产活化的方式予以延续发展。例如结合科普教育、研学教育、民俗风情体验、文化体验等新型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创新盘活文化遗产的路径，如开发四川丹巴乡村深度体验民宿，贵州千户苗寨露天博物馆等，唤醒沉睡的历史文化遗产。

参考文献:

- (1) 孙九霞, 黄凯洁, 王学基. 基于地方实践的旅游发展与乡村振兴: 逻辑与案例[J]. 旅游学刊, 2020, (03).
- (2) (14) (21) 李莺莉, 王灿. 新型城镇化下我国乡村旅游的生态化转型探讨[J]. 农业经济问题, 2015, (06),
- (3) (10) 王勇. 高质量发展视角下推动乡村旅游发展的路径思考[J]. 农村经济, 2020, (08).
- (4) 赵薇.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旅游经济产业提升[J]. 社会科学家, 2019, (09).
- (5) 张新成. 中国乡村旅游公共服务水平时空演化及成因分析[J]. 旅游学刊, 2021, (11).
- (6) 陈仕玲, 叶明霞, 蒋辉. 西南地区“生态旅游——乡村振兴”耦合发展研究——基于云贵川三省的分析 EJ1 农村经济与科技, 2020, (21).
- (7) 王建芹. 西南民族地区特色旅游促进乡村振兴的作用机理与实现路径[J]. 吉林工商学院学报, 2018, (06).

-
- (8) 罗明义. 云南发展乡村旅游的特点和模式[J]. 旅游学刊, 2006, (05).
- (9) Skerriitt D, Huybers T. The effect of international tourism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analysis[J].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2005, (01).
- (11) 朱健梅. 西南地区交通运输发展战略研究[D]. 西南交通大学, 2002.
- (12) 李英勤. 贵州土地石漠化与“三农”问题的经济学分析[J]. 生态经济, 2006, (02).
- (13) 李刚, 吉奕康, 吴剑华等. 复杂敏感环境铁路工程生态风险分析——以西南地区为例[J]. 中国铁路, 2021, (08).
- (15) 寇明婷, 李录堂, 陈凯华. 乡村生态旅游的深层研究[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02).
- (16) 辛本禄, 刘莉莉. 乡村旅游赋能乡村振兴的作用机制研究[J]. 学习与探索, 2022, (01).
- (17) 叶兴庆. 以提高乡村振兴的包容性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J]. 中国农村经济, 2022, (02).
- (18) 张琳, 贺浩浩, 杨毅. 农业文化遗产与乡村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发展研究——以我国西南地区 13 地为例[J]. 资源开发与市场, 2021, (07).
- (19) (22)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司, 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司. 全国乡村旅游发展典型案例汇编[M]. 北京: 中国旅游出版社, 2019.
- (20) 张朝枝, 杨继荣. 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旅游高质量发展分析框架[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2, (01).
- (23) 邹统钎. 乡村旅游: 理论·案例[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8.